

書 評

一本頗有新意的學術專著——《〈國語〉研究》

李佳 著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3.

小16開本，230頁

諸 海 星*

《國語》與《春秋左傳》不同，它不是一部有系統的編年體史書，而是中國第一部分國記載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重要文獻。它分別記載了上起周穆王大征西戎(約967B.C.)，下迄戰國初年韓、趙、魏三家聯合滅智伯(453 B.C.)，約五百餘年間的部分歷史人物的言論和史事。全書共二十一卷，七萬餘字，按照一定順序排列，分別記載周(《周語》三卷)、魯(《魯語》二卷)、齊(《齊語》一卷)、晉(《晉語》九卷)、鄭(《鄭語》一卷)、楚(《楚語》二卷)、吳(《吳語》一卷)、越(《越語》二卷)八國的歷史片斷，所記載的史事，前後並不聯屬，都自成片斷。《國語》以“國”分目，記“語”為主，所以書名為“國語”。它與《春秋左傳》所記載的史事都以春秋時期為主，只不過《左傳》依魯君紀年，記事以魯國為中心，是解釋《春秋》的，被稱為“春秋內傳”；而《國語》則分國繫年，歷史事件以所記國為中心，“其文不主於經(《春秋》)”¹⁾，因此又被稱為“春秋外傳”²⁾或“左氏外傳”³⁾。

* 啓明大學校 中國語文學科 教授

《國語》的作者，自古存在爭議，迄今未有定論。最早提出《國語》作者為左丘明的是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亦見《漢書·司馬遷傳》所引司馬遷《報任安書》。班固《漢書·藝文志》也記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由於《左傳》、《國語》兩書的作者都被認為是左丘明，而且《國語》的記事年代也大部分與《左傳》相合，所以《國語》則被稱為“春秋外傳”。但兩書的體例、組織結構和文章風格區別都很大，顯然非成於一人之手。有關《國語》的作者，在唐宋以前，多執漢儒之說，認為是左丘明。但自(晉)傅玄、(隋)劉炫、(唐)啖助、陸淳，皆以為與左氏文體不類，宋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更認定其“必非出一人手也”，清代趙翼《陔餘叢考》則說“《國語》本列國史書原文，左氏特簡料而存之，非手撰也。”清代崔述《洙泗考信錄·餘錄》進一步說“《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年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一人之手明甚。《國語》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即《國語》非一人之所為也。”據此也可以說，《國語》本身也不是一人之筆。經歷代學者的考校甄別，已基本上推翻了《國語》作者為左丘明之說。但關於《國語》的作者，至今學界仍然無法確考，尚無定論。從內容和語言風格看，《國語》各語非出自一時、一地、一人之手，作者也普遍認為是春秋末期或戰國初期的各國史官。它主要來源於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述，後來經過熟悉歷史掌故的人加工潤色，大約在戰國初期或稍後編撰成書。《國語》雖然在史書的體制上與《左傳》不同，但記事的方式則是一致的，都是通過具體記述重要歷史人物的言論、彼此對話和相互駁難的方式表現了春秋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

總體上說中國古代的《國語》研究，大致可分為三方面：(1)《國語》文字訓詁與注釋校勘研究，其主要成果是傳世至今的幾部《國語》校注本；(2)

- 1) 三國吳 韋昭，〈國語解詁〉，《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661。
- 2) 東漢 班固，〈漢書·律曆志(第一下)〉(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1013。
- 3) 東漢 王充，〈論衡·案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73。

《國語》成書與作者問題研究，集中在《國語》與《左傳》的關係探討上，主要說法和見解基本為隻言片語，散見於各家著作之中；(3)《國語》文學評點研究，其成果主要見於明清時期有關《國語》的評點著作之中。與古代研究情況相比，二十世紀以後的《國語》研究儘管大體仍在上述三方面的範圍之內，但在其深度、廣度和系統性上都有很大的進展。尤其是19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的《國語》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國語》成書與作者以及相關問題研究；(2)《國語》目錄版本與注釋校勘以及文字訓詁考訂研究；(3)《國語》古代制度與社會文化以及思想研究；(4)《國語》語言與文學研究；(5)《國語》引相關典籍與相關典籍引《國語》研究；(6)《國語》與相關典籍的比較或綜合研究。其中，最早《國語》綜合研究的學術成果可認為是由台灣學者張以仁(1930~2009)撰寫的《國語研究》。1958年張以仁在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為《國語研究》，標誌着《國語》專書研究的正式開始。張以仁《國語研究》涉及《國語》版本、校勘、韋昭解訓詁、語言、歷史及人物考訂、舊注輯校、《國語舊音》考校、《國語》與《左傳》綜合研究等多方面。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及台灣地區的《國語》的研究論文已超過500篇，自2000年以來的《國語》研究論著數量比二十世紀100年間發表的《國語》研究論著的總量還要多⁴⁾。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國語》的各個方面，對於《國語》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具有助力作用。另外，韓國國內《國語》的研究情況，雖有古代文人學者的推崇，但當今學界對《國語》的關注向來不夠，研究成果⁵⁾亦顯零散且缺乏深入，有些研究有待於進一步廣泛、深入，還需要有了新的突破。

李佳教授是位中國古代文學及古典文獻學研究專家，四川大學古文獻學專業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傅剛教授的博士生，2009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亞洲語言文化學部助理教授。曾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訪問學者、台灣大學中文系訪問學人、中國國家

4) 郭萬青, <1958年以來的《國語》研究概覽>, 《知識管理論壇》, 2013年8期。
5) 已出版的《國語》翻譯本有全譯3部和節譯1部, 還有碩士論文1篇和單篇論文8篇。

圖書館文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及古典文獻學。在《北京大學學報》、《國學研究》(北京大學)、《文獻》、《史林》、《漢學研究》(台灣國家圖書館)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近40篇，已出版學術專著2部。李佳教授所著的學術專著《〈國語〉研究》，是她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經過多年修改增補，2015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出版發行。本書著者表示：書中主要觀點比較博士學位論文基本上未變，而在具體論述上則多有修訂，另外增補了一章附錄“《文選》注中的《國語》——兼論隋唐之際對《國語》的接受”，這是《國語》後世接受史中一個重要的內容。

《〈國語〉研究》所涉及的研究範圍及其主要內容(目錄)大致如下：

緒論；第一章為歷代《國語》著錄彙考(主要史志的著錄、官修目錄的著錄、家藏目錄的著錄)；第二章為《國語》版本考論(公序本系統、明道本系統、其他重要明清刻本敘錄)；第三章為《國語》編纂考(纂者考——左丘明纂《國語》的說法可信、編纂目的——“求多聞善敗以鑒戒”、從《晉語》三篇擬測《國語》的編纂過程)；第四章為《國語》的性質考辨(“國別史”說和“史料彙編”說、“語書”說、“外傳”說)；第五章為《國語》之“語”的文本研究(對問的形式、論辯的內容、溝通的目的)；第六章為《國語》的結構模式——兼論先秦語類書之發展成熟(一段式和二段式的結構——《國語》與《論語》的比較、三段式和四段式的結構——《國語》與《左傳》的比較、其他先秦語類書與《國語》相似的結構模式)；第七章為《國語》的文學特色(“極組織之工”：語在事中、“悉張弛之義”：高超的說理技巧、綿裏藏針，味尤雋永)；結論。

本書著者根據史料，結合在中國學者《國語》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同時吸收港台和海外研究成果，從目錄版本、編纂成書、篇章結構、文本細讀、文學成就等諸多方面，對《國語》進行了一個較為全面、系統的研究。首先，本書對史志、目錄中關於《國語》記載的疏漏進行了補充、辨正；其次，本書對《國語》版本系統尤其是“公序本”在宋元明時期的刊刻、修補和流傳情況作了清楚描述；最後，重新審視和思考《國語》中衆說紛紜的諸如纂者、編纂目的、性質等相關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並在先秦語類書發展

演進的背景之下，對《國語》進行定位。著者以紮實的文獻資料研究為基礎，結合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而且開拓出新的研究領域，獲得新的研究成果。

筆者個人認為在本書內容中最有價值的是第四章《國語》的性質考辨。《國語》到底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著者將從“國別史”說、“史料彙編”說、“語書”說以及“外傳”說等角度進行探討。其中就“國別史”說和“史料彙編”說而言，如果以“國別史”的概念來觀察《國語》，就會發現該書記史既不完整，對史料的選錄也缺乏標準等問題，這是“國別史”說存在的主要缺陷。“國別史”說是以後來的史書體裁概念規範前代之書，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難以解釋的問題，所以不恰當。而“史料彙編”說重視到《國語》內容所具有的史料價值，也注意到了篇章與篇章間的彼此獨立的特點，部分地解釋了“國別史”說所存在的缺失。“史料彙編”說則完全漠視了《國語》一書所具有的明確編纂目的，和在此目的指導之下編者有標準、有目的地擷取材料的過程，以及編者所作的充實、改寫、潤色，以及篇章結構上的統一工作。雖然《國語》的統一整理未能貫徹始終，但該書編纂“有一定程度的系統性”⁶⁾卻是不容否認的，因此“史料彙編”說也是不恰當的。著者的這些分析既是獨到的見解，又是較為可信的說法。

作為文學博士學位論文，本書的研究重點也就是《國語》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價值部分。首先，本書對“語”體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歸納、分類了《國語》中“語”的形式、內容；對《國語》所記載的“對話”，從對問、論辯和溝通的角度，進行了細緻的文本分析，並且以先秦語類書的發展為背景，探討了《國語》篇章結構的特點。然後，本書參考古人評點的意見以及西方學者析論《國語》的方法，從縝密的邏輯與鋪張的言辭，精緻的謀篇佈局和曲折的故事情節，以及文字綿裏藏針、意味雋永等三個方面，研究《國語》的文學特色。這就從文學的角度，揭示了《國語》的文學史價值。這些頗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都為《國語》研究作出了新的貢獻。

6) 傅庚生，〈前言〉，《國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3。

著者在本書中對於稍不足或涉及不到的地方謙虛地說：“通過本書的撰寫，著者對一些問題已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但是由於材料匱乏，且個人的思考還有待進一步加強，故有些問題暫時無法得出結論，有些也還需要進一步考慮、完善。如日本靜嘉堂文庫和大倉文化財團藏有兩部宋刻公序本《國語》，是重要的校勘材料，但限於條件暫時無法見到，研究只能留待他日。”著者還承認，《國語》一書產生的歷史背景原因、語類書和“語”體的演變、消亡，以及其與諸子散文的關係，都還需要考察。而《國語》對後世文學、史學的影響，本書還沒有涉及，這些都是需要繼續研究的地方。

另外，關於《國語》文學價值方面的研究，還要補充一些筆者個人的淺見，望與本書著者商榷。本書著者基本上認為“《國語》的文學價值向不為人們所重視”，而《國語》作為一部先秦史傳文學作品，其文學價值一直以來都得到歷代文人學者的關注，如唐代文人柳宗元一方面批評《國語》⁷⁾一方面又借鑒了《國語》的敘事方式或文學特徵等等。過去傳統的《國語》文學研究主要包括《國語》的敘事方式、藝術表現或語言特色等散文價值方面。但對於《國語》與敘事文學之關係及其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散文、小說)上的價值和影響，缺乏專家學者的關注和深入研究。

《國語》以記言為主，記事簡略，說理平實，雖然在語言上較為簡潔、質樸，但由文學角度看，有些篇章其敘事頭尾完整，不僅含有合理的虛構和想像成分，亦有不少生動的比喻和含義豐富的警句，而且對人物性格也有較為細緻的刻畫。因而大大增加了故事情節的完整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動性，提高了《國語》的敘事文學價值。尤其是其善於描寫人物生動形象和鮮明性格的對話，為《左傳》的寫作提供了語言藝術的借鑒，至於對《戰國策》的敷張揚厲、恣肆雄辯文風的形成，影響作用就更大了。特別是在記言中展現故事情節，在情節中糅合合理的想像和虛構，以及一些充滿幽默風趣的生動記載等等，不僅包含著更多的小說成分和因素，同時為後世小說的形成和發展

7) 柳宗元從崇經尊史角度出發，指責《國語》“病其文勝而言佞，好詭以反倫。”(〈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柳河東全集》卷31)；“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闢誕。”(〈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柳河東全集》卷31)

積累了部分的敘事藝術經驗。

筆者站在一個外國學者研究先秦史傳文學的立場則認為：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就內容和形式上嚴格地說，不同於一般文學或小說作品。史書要求史家的實錄精神，人物、事件和環境都必須依據史實記敘真人真事，要“忠於史實”，不允許像一般小說作品那樣作者運用想像虛構來有意創作。但是，先秦時期的歷史著作，由《國語》、《左傳》、《戰國策》之類史傳著作來看，都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是歷史著作，嚴格按照史實記載各個不同時期的人物和事件；一方面它又是富於敘事文學價值的珍籍，注意故事的起伏變化和脈絡連貫，通過典型事例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徵，語言生動活潑，富有藝術表現力。其中有些篇章不僅包含著不少小說的素材，甚至某些歷史事件就是用後世小說常用的某些藝術表現手法和細節描寫來敘述和記錄的。這些敘事文學特點，就使歷史著作帶來極為濃厚的小說色彩，而且對後世小說文體的形成和發展都有重要的啓示和借鑒作用。特別是《國語》具有這些較高的敘事技巧和藝術表現手法，在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進程歷史中不斷地發展、成熟和融合，並不斷加以積累，為後世小說的初步形成準備了必要的條件。我們研讀《國語》，一則應予以充分重視其本來的歷史文獻價值，二則應探究其與敘事文學之關係，並對於其敘事文學價值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進行客觀的評價。

筆者與李佳教授是2015年11月在台灣台北初次認識的。台灣師大國文系與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共同主辦在台灣師大召開的“第四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們都被安排在同一組，並先後發表了有關《國語》研究的論文⁸。會議結束後她與先生（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曲景毅教授）一同來訪我住處，並贈送了剛付梓問世的《〈國語〉研究》和《唐代“大手筆”作家研究》（曲景毅著）。2016年2月初筆者赴新加坡短期訪問，藉此機會特意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並拜訪李佳教授。我們第二次見面就暢談了一

8) 李佳教授發表〈中國早期歷史散文中的“依時敘事”與“依地敘事”——以《左傳》和《國語》載述吳越相爭為例〉；筆者發表〈由小說角度看《國語》的敘事文學價值〉。

下午，對於曾經在北京博士生讀書期間的學習過程和學風、從事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的種種經驗、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學術風氣和學者風範、當今新加坡的教育環境和西化趨勢等等話題，無所不談，暢談不已。臨走時她還要請我寫一篇書評，我毫無猶豫地欣然答應，現在寥寥幾筆才寫下粗淺的讀後心得，代為書評。我期待她有更豐碩、更優秀的先秦文獻研究成果面世，而且還深信不久將來她會取得令人矚目的學術成績。